



#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史实新探

——以“亢慕义斋”的藏书与编译为中心

□吴冕\*

**摘要** “亢慕义斋”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图书室,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具体考证,整理出目前所知“亢慕义斋”收藏及编译的具体书目,并据《京汉工人流血记》中所录的《共产党宣言》译文和《椿园载记》等现存史料,考察“亢慕义斋”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相关史实。

**关键词** 北京大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亢慕义斋 人民出版社 《共产党宣言》

**分类号** D231 G23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2.05.015

1920年3月,在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秘密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的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这是中国最早开始系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了方便工作,在征得校长蔡元培的同意后<sup>[1]</sup>,于当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正式公开。蔡元培还在校内拨了两间屋子供研究会使用,其中一间就作为研究会的图书室,名叫“亢慕义斋”,德文作Das Kammunistisches Zimmer(意为“共产主义小室”)<sup>[2](87)</sup>。因其作为研究会的重要活动场所且藏书丰富,“亢慕义斋”遂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意义研究得较为深入,但对其相关活动的史料挖掘工作仍待进一步开展。从民国图书、报刊等史料中寻找信息,能够揭示出“亢慕义斋”具体的藏书及编译情况。透过翔实的史料考证,不仅可以还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大图书馆以及北京大学当年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史实,也为进一步认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提供了新的角度与思考。

## 1 “亢慕义斋”藏书

### 1.1 “亢慕义斋”藏书来源

“亢慕义斋”曾购买和入藏了较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亢慕义斋”的藏书“或系会有,或系私有,皆有符号,归众共览”<sup>[3]</sup>,“一部分是由北大图书馆购进转给学会的,大部分则是第三国际代表东来后,陆续由第三国际及其出版机构提供的”<sup>[2](87)</sup>,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本身就有筹集经费以购买图书的义务<sup>[4]</sup>。综合而言,“亢慕义斋”的藏书主要有以下四个来源:私人图书、会员筹集经费采买的图书、北大图书馆转来的图书、第三国际及其出版机构提供的图书。

### 1.2 “亢慕义斋”藏书情况

根据现存的史料,可部分还原“亢慕义斋”当年的藏书情形。1921年11月1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894号第四版登载了《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sup>①</sup>》,其中提到研究会“筹集了百二十元的购书费,至少要购备《马克思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各书现已陆续寄到,并且马上就要找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的用”<sup>[4]</sup>。

1922年2月6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950号第四版上又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

\* 吴冕,ORCID:0000-0002-3871-125X,邮箱:wum@lib.pku.edu.cn。

①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尚未确立统一的翻译标准,“马克思”“马克司”“马格斯”等皆为“马克思”的不同译法。



(四)》,称研究会当时“已有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sup>[3]</sup>。详考此通告,可知实际载有英文书籍 47 种,中文书籍 20 种;英文报刊 4 种,中文报刊 15 种。

1922 年 4 月 24 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 1009 号第四版上还有《马克司学说研究会图书馆通告(第二号)》,该通告记载:“本会新到英文书籍七十余种,杂志十余种并德文书籍、杂志七八十种”<sup>[5]</sup>,这些新到的书籍很可能就是“尚有四、五会员出金购买一百四十元之英、德文书籍”<sup>[3]</sup>。合计可知,当时的“亢慕义斋”收藏英文书籍和报刊 131 种以上,中文书籍和报刊 35 种,德文书籍、杂志七八十种。

1922 年 12 月 13 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 1132 号第三版则登载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求会员启事》,其中提到:“本会备有关于马氏学说之书籍数百部,专为有志研究马克思学说诸同志而设……其在京之会员,得向本会借阅书籍(备有汉文、英文、德文、俄文,各项书籍借期以半月为限……)”<sup>[6]</sup>。

从上述启事和通告中可以看出,“亢慕义斋”当年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收藏颇具规模,不仅藏书数量较大,且文种丰富,备有多种外文原典。

### 1.3 “亢慕义斋”旧藏八种

以上为史料中记载的书目信息,而在此之外,根据钤在书上的“亢慕义斋图书”印记(据罗章龙回忆,这枚印章是由他设计,宋天放刻成的<sup>[2](87)</sup>),可以确认北大图书馆尚存“亢慕义斋”旧藏八种:

(1) N. Lenin. *Die Grosse Initiative*. Unionverlag Bern, 1920(列宁《伟大的创举》,伯尔尼联合出版社 1920 年版,封面钤印)。

(2) N. Lenin. *Der “Radikalismus” die Kinderkrankheit des Kommunismus*. Herausgegeben vom Westeuropäischen Sekretariat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Leipzig, 1920(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莱比锡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 1920 年版,封面钤印)。

(3) Clara Zetkin und Henri Walecki. *Dem Reformismus entgegen*.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Hamburg, 1921(蔡特金、瓦勒齐《反对改良主义》,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 1921 年版,书内钤印)。

(4) E. Brand und H. Walecki. *Der Kommunismus in Polen*.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Hamburg, 1921(布兰特、瓦勒齐《共产主义在波兰》,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 1921 年版,书内钤印)。

(5) G. Sinowjew. *Die Roll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Herausgegeben vom Westeuropäischen Sekretariat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0(季诺维也夫《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共产国际西欧办事处 1920 年版,封面钤印)。

(6) G. Sinowjew. *Zwölf Tage in Deutschland*.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Hamburg, 1921(季诺维也夫《德国十二天》,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 1921 年版,书内钤印)。

(7) G. Sinowjew. *Alte Ziele Neue Wege*.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Hamburg, 1922(季诺维也夫《旧目标新道路》,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 1922 年版,封面钤印)。

(8) L. Trotzki. *Die Fragen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Hamburg, 1922(托洛斯基《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和共产国际》,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 1922 年版,封面钤印)。

这八本书籍皆为德文版,很有可能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Veginsky)来华时赠送的<sup>[7]</sup>。且这八本书的出版年代较早,亦颇具版本与史料价值。

## 2 “亢慕义斋”编译梳理

### 2.1 “亢慕义斋”与人民出版社

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各项活动中,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此项工作虽也有相关文章讨论,但颇有可补充的新材料。通过对民国报刊等史料中相关记载的系统梳理,可以呈现当年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的相关情形,这对加深理解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较大的帮助。

罗章龙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曾说:“‘康慕尼斋’<sup>①</sup>,译书规划曾刊登在一九二三年的《向导》上。在这个规划中,康慕尼斯特丛书有十

① “康慕尼斋”即“亢慕义斋”,下文“康慕尼斯特丛书”即“康民尼斯特丛书”,“列宁丛书”应为“列宁全书”,“马列主义丛书”则是“马克思全书”。



种,列宁丛书有十四种,马列主义丛书有十四种。这个规划中的书,主要是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译作的。其次还有联合广州、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同志(如武汉恽代英同志)翻译的。这些丛书翻译出来的约有一半,没有全部译完,这是因为大多数会员从事工人运动,参加实际斗争去了”<sup>[1]</sup>。他后来又又在《椿园载记》中提到:“前后规划有二十种,陆续译成付印,一九二三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根据人民出版社通告(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八号)<sup>①</sup>,该社编译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共计四十八种,其中标明康明尼斯特丛书十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均系亢慕义斋翻译任务。又马克思全书十四种,是亢慕义斋与上海、广州同志分任编译的,书中编译者大都用笔名,其它九种亦同”<sup>[2](89)]</sup>。

1921年8—9月间,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sup>[8]</sup>。有关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情况,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说:“本年秋季,在上海还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社址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共产主义者丛书十一种,其他九种,但在这一年内,只出版了十五种,如:《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苏维埃论》《共产党星期六》《哥达纲领批判》等书”<sup>[9]</sup>。罗章龙和李达的回忆描述了人民出版社的大致出版情况,但细节颇有可商讨之处。在讨论“亢慕义斋”具体参与了哪种书籍的翻译之前,必须先详尽考察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情况。

### 2.1.1 人民出版社总书目

关于人民出版社的具体书目,《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上最先刊登了《人民出版社通告》,拟定了“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明尼斯特丛

书”11种,“其他”9种,总计49种。

《人民出版社通告》不仅在《新青年》刊登,也附在一些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的书后。据1922年2月初版《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和1922年4月初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可知原拟定书目实际又有所调整:“康民尼斯特丛书”增加《共产主义与妇女》《俄国革命与社会革命》2种,“其他”增加《李卜克内西纪念》《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劳农俄国问答》3种。

在1922年4月2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的《青年周刊》第六号中缝里,载有人民出版社的“介绍新书”<sup>②</sup>,“其他”增加了《共产党》月刊(《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也登有《共产党月刊社启事》,发售处中包含人民出版社),《两个工人谈话》(又见《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出版新书”),《阶级争斗》(又见1922年4月14日出版的《广东群报》第二页“新书出版”<sup>③</sup>)3种。

1922年5月16日出版的《广东群报》第二页上,人民出版社的“新书出版”<sup>④</sup>还增加了《劳动运动史》(又见《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出版新书”<sup>⑤</sup>和1922年10月15日出版的《先驱》第十二期中缝“新书出版”<sup>⑥</sup>),《马克思纪念册》(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五月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二万本”<sup>[10]</sup>)2种,同属“其他”这一分类<sup>⑦</sup>。

另据张人亚藏书<sup>[11]</sup>,有《五一特刊》1种<sup>⑧</sup>(现藏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sup>[12]</sup>,应与《马克思纪念册》和《李卜克内西纪念》分类相同。

李达在前文的回忆中提到出版了《苏维埃论》,罗章龙则又提及:“我还将德文版《震撼世界的十日》翻译过来,作为学会的学习资料,后来送给广州人民

① 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而发行等事务则在广州进行,现在见到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实物,封面写“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版权页则为“人民出版社”。下文“康明尼斯特丛书”“共产主义者丛书”同为“康民尼斯特丛书”。

② 《青年周刊》第七、八号中缝的“介绍新书”与第六号相同。

③ 列有《阶级争斗》的“新书出版”,在1922年4—5月间出版的多期《广东群报》上刊登。

④ 有关《劳动运动史》和《马克思纪念册》的“新书出版”,在1922年5月间出版的多期《广东群报》上刊登。

⑤ 《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出版新书”中的“其他”分类列有《劳动运动史》,而在同期的“劳动运动史出版了”(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也有)的书讯中,《劳动运动史》又作为“劳动学校教科书”的一种。该书由施光亮编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行,人民出版社经售。

⑥ 包含《劳动运动史》的“新书出版”又见《先驱》第十三、二十一、二十三期中缝。

⑦ 这2种书在《广东群报》的“新书出版”中原本分类,《劳动运动史》的归类今据《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出版新书”确定,而《马克思纪念册》则据《李卜克内西纪念》的分类推定。

⑧ 张人亚还藏有《唯物史观解说》与《京汉工人流血记》2种,据现有史料,暂不列入人民出版社书目。



出版社出版,但原稿被遗失了”<sup>[1]</sup>,这2种书暂未知分类。

这样,人民出版社书目的总数便达到62种,分别是“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3种,“其他”18种,未知2种。

根据以上信息,以1922年2月初版《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和1922年4月初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2种书后所附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为基础,再结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sup>[13]</sup>、中国国家博物馆<sup>[8]</sup>等保存的实物情况,可以推测上述书目中已出版的共有26种,分别为:

“马克思全书”4种,即《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全书第一种”<sup>[14]</sup>,已出版),《工钱劳动与资本》(“马克思全书第二种”,1921年12月初版),《马格斯资本论入门》<sup>①</sup>(“马克思全书第三种”<sup>[14]</sup>,已出版),《哥达纲领批评》(印刷中<sup>②</sup>);

“列宁全书”7种,即《劳农会之建设》(“列宁全书第一种”,1921年12月初版),《讨论进行计划书》(“列宁全书第二种”,1921年12月初版),《共产党礼拜六》<sup>③</sup>(“列宁全书第三种”,1922年1月初版),《列宁传》(“列宁全书第四种”,1922年1月初版),《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sup>④</sup>(“列宁全书第五种”,1922年2月初版),《国家与革命》(印刷中),《现在的重要工作》(印刷中);

“康民尼斯特丛书”4种,即《共产党底计画》<sup>⑤</sup>(“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一种”,1921年12月初版),《俄国共产党党纲》(“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二种”,1922年1月初版),《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三种”,1922年1月初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康民尼斯特丛书第四种”,1922年4月初版);

“其他”9种,即《李卜克内西纪念》(1922年1月

15日出版),《俄国革命纪实》<sup>⑥</sup>(1922年1月初版),《劳动运动史》(1922年4月10日初版),《五一特刊》(1922年5月1日出版),《马克思纪念册》(1922年5月5日出版),《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已出版),《两个工人谈话》《阶级争斗》《共产党》月刊;

“未知”2种,即《苏维埃论》和《震撼世界的十日》。

### 2.1.2 人民出版社书目分析

对于上述26种书目的有关情况,还需进一步说明:

其一,《广东群报》不仅登载了人民出版社的“新书出版”,还在1922年3月2日第四页上登载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上发布了《共产党底计画》《俄国共产党党纲》《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3种书的章节目录,又在1922年2至3月间连载了《共产党底计画》译文,并在同年4至5月连载了《列宁传》的译文。

其二,《苏维埃论》和《震撼世界的十日》2种书,都只见回忆,缺乏其他佐证,亦未见实物。

其三,《现在的重要工作》在《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和《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书后所附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中都标明“印刷中”,《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标为“已出版,非卖品”,目前也都未见实物。《哥达纲领批评》也标注为“印刷中”,但未见人民出版社出版实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3年5月5日出版的单行本<sup>[8]</sup>。《两个工人谈话》亦未发现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实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该书的其他版本<sup>[8]</sup>。

其四,前文罗章龙的回忆曾提及人民出版社的书目中包含“重版书籍”,但人民出版社或许受当时出版条件等因素制约,并未新出版或重印过《共产党

① 《人民出版社通告》载此书为《资本论》,各书目多称为《资本论入门》(如《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新书出版”、1923年1月15日出版的《新江西》第一卷第三期“本刊介绍重要的书报”),也有称《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如1922年4月2日出版的《青年周刊》第六号中缝“介绍新书”及1923年7月11日出版的《向导》第三十一、三十二期合刊“新青年社举行大廉价”)和《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如1922年2月6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950号第四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的。现据北京大学所藏实物(缺出版信息)及“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2种,确定书名为《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以便下文论述。1923年1月15日出版的《新江西》第一卷第三期“本刊介绍重要的书报”,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归入“其他”分类。

② 印刷、出版的情况与《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人民出版社通告》所载不同之处,皆据1922年2月初版《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和1922年4月初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2种书后所附的《人民出版社通告》及实物信息而定,下同。

③ 《人民出版社通告》载此书为《共产党星期六》,现据实物而定。

④ 《人民出版社通告》载此书为《劳农政府之效果与困难》,现据实物而定。

⑤ 《人民出版社通告》载此书为《共产党计画》,现据实物而定。

⑥ 陈独秀的报告把《俄国革命纪实》放在了“康民尼斯特丛书”中。



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这3种书籍，而是考虑到原出版这3种书籍的机构也都与党组织关系密切，所以直接将这些出版物也列为人民出版社的书目。以下几个现象能从侧面帮助理解相关情况：

(1)《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的“新书出版”，虽然把《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分别标为“马克思全书第一种”和“马克思全书第三种”，但在实际排序上，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全书第某种”的顺序排列，而是将两本书都排在标为“马克思全书第二种”的《工钱劳动与资本》之前。《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的“出版新书”，未标“马克思全书第某种”，而三种书的排序与第九卷第五号相同。因此可以推测其顺序是按三种书实际出版时间的先后，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和《(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可能没有再重新出版，而只是被列入人民出版社的书目中重新加以揭示。

(2)《劳动运动史》既收录在人民出版社书目中，又是“劳动学校教科用书”的一种，而《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则原属于“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阶级斗争》则是“新青年丛书”。

(3)《共产党》月刊和刊载在其上的《国家与革命》这2种文献，也都被收录在人民出版社书目中<sup>[8]</sup>。

而当人民出版社并入新青年社后，新青年社在继续发售存余的人民出版社书籍时，依然有沿用人民出版社原分类的情况，但“其他”分类中的书目时有变化。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的“新青年社举行大廉价”并未再分类，其中列有《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记实》《两个工人谈话》《京汉工人流血记》《共产党》月刊5种书目。1923年12月20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二期“新青年社出版书报目录”中，包含“其他”分类，所列书目也是5种，但把《共产党》月刊这一书目换成了《精神讲话一班》。1924年8月1日出版的第三期与同年12月15日出版的第四期《新青年》季刊上，则都在第二期的基础上增加了《向导》汇刊（第一期到第五十期）。而到1925年4月22日再次复刊的《新青年》第一期（列宁号），又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的书目基础上，把《新青年》季刊（四册），《新青年》（八、九卷全，共十二册），《前锋》（一、二、三）放在了里面。

在另外几种刊物上，也发现了新青年社的书目，

如1923年1月15日出版的《新江西》第一卷第三期“本刊介绍重要的书报”上，“其他”分类中列了《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记实》《(马格斯)资本论入门》3种。1923年7月11日出版的《向导》第三十一、三十二期合刊中的“新青年社举行大廉价”，则和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的相同。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前锋》第2期“新青年社出版书报目录”下的“其他”分类，所列的书目是《京汉工人流血记》《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记实》《两个工人谈话》4种。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发现，无论是人民出版社的书目，还是后来的新青年社书目，“其他”分类中所属的书目具有一定的重合。这个情况也许能够说明，各出版机构的不同书目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情形，或者说，正因为有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所以各书目间的界限才并不那么分明。

其五，北大图书馆为人民出版社书目提供翻译底本的可能性。在近年来新发现的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期间所形成的《1919~1920年西文图书登录簿》上，记载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国家与革命》英文版以及《劳农会之建设》英文版等图书。而关于当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情形，又一直有着其参考北京大学所藏《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说法，因此北大图书馆“极有可能为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提供了一部分原始文献底本”<sup>[15]</sup>。

### 2.1.3 “亢慕义斋”的参与情形

通过上述分析，人民出版社的书目总体情况基本明晰，以下将进一步考察“亢慕义斋”参与人民出版社书籍翻译的具体情形。

人民出版社拟定的书目较多，实际出版的书籍也有十数种，目前可以完全确认的“亢慕义斋”翻译作品有李梅羹（墨羹、梅羹）的《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和《国际劳动运动中重要时事问题》2种。而从北大图书馆为人民出版社书目提供翻译底本的可能性与北大人张西曼（张西望）也参与翻译出版了人民出版社书目中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一书等史实来看，包括“亢慕义斋”在内的北大人，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亢慕义斋”不仅参与翻译人民出版社的这些书目，也集中收藏过《共产党底计画》《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画书》等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实物（见《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这也可以说明,在早期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亢慕义斋”切实达成了集收藏、研究、传播于一身的目标。而这种集多项功能于一身的难得条件,又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北大乃至在全国的传播。

## 2.2 “亢慕义斋”参与其他著作编译

除参加人民出版社的编译书目外,“亢慕义斋”还参与编译了其他一些著作:

(1)《京汉工人流血记》,罗章龙、高君宇等编写,北京工人周刊社1923年出版,京汉铁路驻沪办事处1923年5月曾翻印。此书是记录二七大罢工情形的重要史料,也是见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与工人运动的宝贵资料。

(2)《非宗教论》,萧子升、罗章龙编写,北京新知书社1922年版,该书是“亢慕义斋”同人探讨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成果。

(3)《康德传》,商章孙、罗章龙合译,中华书局1922年版,该书是罗章龙现存较早的翻译成果。

(4)《哲学概论》,此书由杨东莼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一起翻译<sup>[16]</sup>,目前尚未发现出版实物。

## 3 “亢慕义斋”翻译《共产党宣言》考察

### 3.1 《京汉工人流血记》中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亢慕义斋”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有关史实,长期以来因文献资料的阙失而无法进一步阐明。所幸《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中留存了一段摘录的《共产党宣言》译文,通过与其他史料的相互印证,可以大大加深对此翻译工作的认识,也有助于切实了解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年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艰辛。

关于“亢慕义斋”翻译《共产党宣言》所形成的译文有关情况,罗章龙最先明确提到:“《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部份译文曾被《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引用过”<sup>[1]</sup>,郑天喆主编的《〈共产党宣言〉研究》一书也提到:

据罗章龙回忆,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研究会还成立了翻

译室,他们几个学德文的同学曾译出过不太全的《共产党宣言》并有油印本,此译本的部分译文曾被《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引用过。现已查明《京汉工人流血记》(1923年)确曾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的文字,例如其序文前页的花框内录有“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下行是“共产党宣言”。遗憾的是此油印本至今未曾查到<sup>[17]</sup>。

核对1923年版《京汉工人流血记》目录后的花框内,确有“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sup>①</sup>。更为重要的是,第六章前的花框内还有另一段摘录的《共产党宣言》译文:

自从有产阶级得势,那封建的,宗法的种种关系便到处被他们消灭了,结合人和他的家长的封建的纲常被他们尽情剪断了,人和人间除了明目张胆的自利,和刻薄寡情的现金主义,再也没有别的关系<sup>[18]</sup>。

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李泽彰译作:

有产者只要占了上风,那封建的,家长的,山村的种种关系,都被他割断了。就是那最不易脱离的“天生的超人”的封建关系,也被他一刀两段,打破得干干净净,弄成人和人的中间,不过是自私自利的关系,不过是金钱的关系<sup>[19]</sup>。

陈望道则译作:

有产阶级得了权势,那封建的,家长的,山林的种种关系,便到处被他们消灭了。结合人和他的“生来的长上”(Natural Superiors)的封建的线索,被他们尽情剪断了。人和人中间,除了明目张胆的自利,刻薄寡情的现金主义,再也找不出甚么别的联结关系<sup>[20]</sup>。

《京汉工人流血记》摘录的这段译文,尚未引起学界特别的注意。查考用词和语句的顺序,这段文字明显与李泽彰的译本相去较远,而与陈望道译本则较近,那么其与陈望道译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 3.2 《共产党宣言》翻译史实考辨

以现有史料推测,《京汉工人流血记》摘录的这段译文很有可能是“亢慕义斋”成员们在学习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时参考了陈望道译本后的成果,理由如下:

第一,译书地点的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

<sup>①</sup> 北京大学收藏的《京汉工人流血记》略有缺页,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京汉铁路驻沪办事处1923年5月翻印版则保存完整,此处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而定。



始是秘密活动的,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艰苦可以想见。当具备公开的条件时,研究会就在1921年11月1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894号第四版上刊登了《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其中提到“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的用”,这一份公开启事,不仅仅解决的是“名分”问题,同时还解决藏书和活动空间的问题。一个较为合理的历史情形或许是这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公开并得到蔡元培特拨的房子后,也就是“亢慕义斋”的实体建立后,研究学习及翻译工作才有了较好的工作条件。研究会的成员们或许萌生翻译的念头很早,也可以在宿舍等地点进行一些相关工作,但多人的集中学习和翻译,仍当在备有丰富藏书的“亢慕义斋”进行,否则就不必要建立专门的藏书室且广搜书籍了。

第二,研究计划的开展。根据1922年2月2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947(原误作946)号第四版上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有研究《共产党宣言》的计划:“由几个感觉英文程度不佳的会员组成的,采此书为教本,每星期一、四、五晚请会员一人教授之”<sup>[21]</sup>。而四天之后,即1922年2月6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950号第四版上又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其中所列的藏书,既有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有陈望道的中译本。从研究计划和藏书等角度推测,“亢慕义斋”成员们在学习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时,同时参考陈译本是较为合理的。

第三,翻译时间线的考察。目前关于“亢慕义斋”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说法,最早来源是罗章龙,他最开始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文中说:

我们德文组曾译过《共产党宣言》,是从德文本翻译的,有油印本。我想,1920年毛主席到北京时,大概已有一个《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了,也可能不是全译本<sup>[1]</sup>。

而在《椿园载记》中,他提到了更多细节:

开始,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基础和翻译技术。以后,慢慢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

……我们最先翻译的一本书是《英马鲁埃·康德传》,接着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以后又试译《资本论》……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以后,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在这个版本<sup>[2](89-90)</sup>。

在上述两次回忆中,罗章龙一会说“开始,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一会又说“我们最先翻译的一本书是《英马鲁埃·康德传》,接着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一会还说“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因罗章龙的说法是远在几十年后的追忆,其中难免有矛盾之处,但这也揭示出厘清翻译时间线的重要性。从“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基础和翻译技术”透露出的历史情形,以及商章孙、罗章龙合译的《康德传》在1922年既已出版的事实来看,似乎可以这样推测:罗章龙等人是先开展《康德传》《马克思传》《震撼世界十日记》等文献的相关工作,而后再渐次深入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的学习与翻译。

第四,翻译者的学养情况。提到翻译锻炼,就不得不考察当时研究会成员们的学养情况。尽管北大当时的师资力量、学生素养和研究条件较优越,但会员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仍不甚深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开宗明义就说,“但是我们愿意研究他底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一)关于这类的著作博大渊(按原误作满)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重要的先务。但是现在图书馆底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济底制限也是一样的贫乏”<sup>[4]</sup>。当时被公认理论水平较高的刘仁静,也在《回忆我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中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毕竟是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组织,总的水平是不高的”<sup>[22]</sup>。因此对于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即使会员们很早就有学习的想法或零星的实践,真正开展起来,也极需借助相关资料并循序渐进,有一定锻炼之后才能上手。



第五,党组织的领导。在前文考察人民出版社书目时,就已发现《京汉工人流血记》出现在1923年的新青年社书目中。而前文也已讨论过各出版机构的不同书目之间存在关联的情形,实际上,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各机构、团体间的联系是较为紧密的。包惠僧回忆说:“‘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方面的活动”<sup>[23]</sup>,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的实际活动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而当时党组织的领导者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精深化研究的倾向<sup>[24]</sup>,各地对翻译工作都较为重视,陈望道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前后,也大致是上海的早期党组织酝酿并成立的时间。北京的早期党组织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对原有的松散、非正式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sup>[24]</sup>。

综上所述,可以进行如下推测:目前留存在1923年版《京汉工人流血记》中这段尚未引人注意的《共产党宣言》译文,很可能是“亢慕义斋”成员们在学习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时借鉴陈望道译本而后形成的成果。由于罗章龙、高君宇负责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这段极有可能出自“亢慕义斋”成员们之手的翻译语句就这样被编辑到书中去了。

这一段保存至今的《共产党宣言》译文,为理解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努力提供了更多的史料支撑。从这段即便可能是带着“学习”痕迹的译文,依然可以展现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断进取、刻苦钻研的精神,这不仅是当时浓厚学习风气的直观体现,也大大培养和锻炼了会员们的理论水平。而经过进一步理论锻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们,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认识,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好地传播。

#### 4 结语

根据现存史料,对“亢慕义斋”藏书及编译情况的详细考察如上所述,其中呈现出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诸多特点是颇有启发性的。“亢慕义斋”收藏的文献既有来自北大图书馆的代购与转赠,也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其藏书不仅包括外文原典,也包括了其参与编译的人民出版社书目。《京汉工人流血记》中新发现的《共产党宣言》译文,更为全面认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相关活动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观察角度。而有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更多史实,仍有待将来继续挖掘。

#### 参考文献

- 1 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J].新文学史料,1979(3):9-15.
- 2 罗章龙.椿园载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3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N].北京大学日报,1922-2-6(4).
- 4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1-11-17(4).
- 5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图书馆通告(第二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2-4-24(4).
- 6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求会员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2-12-13(3).
- 7 张红扬.书传马恩列文载“亢慕义”——早期革命文献撷珍[N].中华读书报,2011-9-21(18).
- 8 张志华.人民出版社与建党初期的图书出版[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8):115-128.
- 9 知识出版社.一大回忆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20.
- 10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86.
- 11 侯俊智.建党初期人民出版社出版图书品种考[J].印刷文化(中英文),2021(2):83-89.
- 12 张人亚革命事迹调研组.张人亚传[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106.
- 13 陆米强.建党时期人民出版社成立始末[M]//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19-424.
- 14 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书[J].新青年,1921,9(5).
- 15 邹新明,陈建龙.从北京大学图书馆《1919~1920年西文图书登录簿》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传播[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37(5):5-11.
- 16 杨东莼.杨东莼文集(论文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22.
- 17 杨金海,郑天喆.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卷):《共产党宣言》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542.
- 18 北京工人周刊社.京汉工人流血记[M].北京:北京工人周刊社,1923:86.
- 19 李泽彰.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J].国民,1919,2(1).
- 20 陈望道.共产党宣言[M].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1920:5-6.
- 21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三)[N].北京大学日报,1922-2-2(4).
- 22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第一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63.
-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41.
- 24 袁超乘,冯玲.中共建党前后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考辨(1920~1923)[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6):4-15.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22年2月23日

修回日期:2022年5月17日

(责任编辑:李晓东)

(转第93页)